



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沿（第一辑）

报人成舍我研究

◎ 李 磊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人成舍我研究/李磊编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657-0185-6/K·0185

I. ①报… II. ①李… III. ①成舍我(1898~1991)-人物研究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606 号

报人成舍我研究

作 者 李 磊
责任编辑 赵丽华 欣 雯
封扉设计 魏 东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30×988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57-0185-6/K·0185 定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自序

由于各种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现代著名报人成舍我先生的研究工作在大陆地区一直受到了很大的忽略。这是因为对成舍我的研究,无法绕过国共对峙时期关于新闻史上“第三条路线”的争议,无法绕过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自由主义现象,无法绕过当时中国特殊社会背景下的新闻产业化等一系列错综复杂、颇为棘手的学术问题。所以迄今为止,大陆地区新闻学术界对成舍我先生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出现系统的、全面的态势,其零碎的研究成果也与这位世界新闻史上工作年龄最长,曾经在中国现代新闻界——特别在业界与教育界——做出过突出成绩、赢得过较高声誉、拥有过很大影响力的著名报人之地位不甚相称。

2009年上半年,因机缘巧合,我申请到了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心的一份特聘研究员工作,有幸赴台进行半年的专业研究。在中心主任成露西女士的建议与指导下,我对成舍我先生的一生志业产生了学习与研究的浓厚兴趣。

本书所收录的一系列文章,就是我从2009年赴台以后陆续研究撰写的一些相关论文。这些论文是我在研读成舍我先生所办报刊、文选和有关成氏的学术论文、回忆录、纪念文献等资料基础上的一些学习思考之作,见识粗浅、史料杂碎、领域零散、未成体系。本来,这些习作难登大雅之堂,但因为大陆地区有关成舍我先生的研究成果较为稀少,所以我也就不揣冒昧,赧颜付梓,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促使我结集出版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一,因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隔离,有关成舍我先生的资料汇集工作一直不甚系统,未趁便利。台湾方面近年来虽然整理出版了一些有关成氏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但却还不能便捷地为大陆学者所获悉(比如成露西编审订,唐志宏主编的《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大陆学者相对而言较难购买得到,只有在国家图书馆等处才有),特别是关于成舍我先生在大陆期间的相关资料(1898-1949年间),连台湾方面都还没整理完毕,结集出

版——就是出版了,恐怕大陆学人撷取这些资料依然存在一定的困难。

基于以上考虑,我以为将这两年我个人在海峡两岸所搜求得来的一些成舍我先生的文献——它们主要是成舍我先生在大陆期间撰写的文章,主旨相对集中于成氏关于新闻学方面——附录于本书之后,公之于世,可能是一件有益于大陆地区对成氏新闻思想与理念有兴趣的学习者、研究者的事情。另外附录中的成舍我年谱、成舍我研究文献资料汇编等相关资料,对成舍我研究工作者亦不无裨益。

其二,为了支持新闻学术研究工作,我所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提供了一笔出版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学院教师与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出版,这就为本书得以付梓提供了一个难觅的良机。须知当今中国(大陆)出版界对偏冷学术成果(特别是历史类、非主流类)的冷淡与忽视十分普遍(我个人很理解企业化以后的出版社的难处),基础性学术类研究成果与文献资料的出版简直难于上青天。虽然自己对本书中的许多文章质量不甚满意,但我实在不愿意放过这一佳缘。因此本着“先有后好”的想法,结集成书,以求先行出版问世为宜。

所以说,这本不成熟的《研究》得以出版要感谢各方的支持,首先要感谢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的成露西主任;其次要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的雷跃捷书记、陈作平副院长,还要感谢推荐我去台湾研修的方汉奇座师,中国新闻史学会赵玉明会长,台湾世新大学的成嘉玲董事长、赖鼎铭校长、熊杰副校长等尊师前辈、领导同侪;还要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蔡翔社长和欣雯女士,没有他(她)们的亲切鼓励、鼎力相助,这本薄书绝对无缘问世。

2010年3月,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极为震惊地从师姐程曼丽教授(时任新换届后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口中听闻了我赴台研修的指导导师、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馆长、世新大学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心主任成露西先生遽然去世的噩耗!顿感世事无常、悲从心来!成露西先生是成舍我先生的幼女,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的女性社会学权威。在台短短的半年期间,成主任对我既亲切关心,亦督导不辍。她的西方化学术视野、严谨的学术研究方式和对研究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这与其父舍我先生何其相似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来我预备做出一些研究成果后再呈现给她,以期获得她宝贵的指点教诲。不想天人隔绝、永为憾事!所以,我谨以恭敬的心情,将这本研究成舍我先生的习作,题献给成露西主任,以示我对她无以言表的感激与深刻的怀念之情。

成舍我先生的文章写作与刊登在他活动的那个时代,在文字体例,标点符号及

写作方式上都迥异于今,为保持文献历史原貌,行文中除了对明显妨碍文意理解之处略作调整以外,尽量保持原来的状况,以避无意间窜改作者原意之虞。书中征引的文献主要以成氏在大陆期间发表的阐述新闻事业方面的文章为主,以年代为序,逐次排列,是以为记。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博士后研究员

李磊谨书于北京

2010年10月10日

目 录

成舍我研究

成舍我“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研究 / 2

成舍我“二元化”办报思想初探

——对上海《立报》发刊辞的一个解读 / 52

一篇反映成舍我办报思想的重要文献

——对成舍我 1932 年 4 月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周的演讲稿《中国报纸的将来》的一个解读 / 60

成舍我北平《世界日报》副刊《新闻学周刊》扫描 / 73

成舍我：坎坷办报历一生 / 82

成舍我新闻制度设计理念刍议

——读《我所建议战后新闻新制度》有感 / 91

成舍我与抗战宣传工作 / 98

附录 成舍我文选

中国报纸的将来 / 108

我们的两个目的 / 123

报学琐谈之一——新闻来源与报馆责任 / 125

报学琐谈之二——图画版之意外效用 / 126

报学琐谈之三——旧杂志及旧报之效用 / 127

报学琐谈之四——六万余元之字谜悬奖 / 128

报学琐谈之六——罗斯福欢迎报纸指责政府	/ 129
巴黎之“无敌晚报”——报学琐谈之七	/ 130
国难期间政府与报纸——欧战时鲁意乔治新闻政策之回忆(报学琐谈之八)	/ 131
报纸其“神龙”乎——续报学琐谈	/ 132
谈晚报	/ 134
报纸救国	/ 137
一个真正的报人	/ 140
我们的宣言	/ 143
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	/ 146
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开学典礼致辞	/ 152
真假新闻	/ 156
报人生活	/ 157
新闻检查仅因对外而存在(节选)	/ 158
“纸弹”亦可歼敌	/ 161
我们需要平价报	/ 169
“新闻记者法”的缺点及补救办法(上)	/ 173
“新闻记者法”的缺点及补救办法(下)	/ 177
报纸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	/ 181
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	/ 193
出版法讨论特辑:发言稿(成舍我发言部分)	/ 197
 成舍我先生年表	 / 200

成舍我研究

成舍我“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研究

在中国新闻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成舍我一直是一个被人忽略的人物——特别是在我国大陆地区。

但实际上,成舍我是一位业绩卓著、影响深远的新闻知名人物。他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所创造的多项纪录迄今无人超越,拥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终身以新闻事业为唯一志向,从事新闻事业时间最长、年龄最高的一位专业人士。从1913年他为安徽《民岩报》撰稿算起,到1988年仍以91岁高龄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直到1991年逝世,从事新闻事业达77年之久,此项纪录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仅见,就是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无人企及!

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位经历见证了辛亥革命震荡、五四运动、民初军阀割据、国共两次内战、八年抗日战争、两岸长期对峙、台湾“戒严”“解禁”、大陆改革开放等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诸多重大历史风云的新闻人士。

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尝试创办现代连锁“报业托拉斯”(世界报系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和《世界画报》)的“新闻大王”。

成舍我是一位成功的报人,他创办的上海《立报》最高发行量曾经达到过20万份,是当时中国日报创办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他的《世界日报》也曾经在北平达到过3万多份的该市最大发行量。

成舍我是创办新闻教育机构最多的一人。他先后创办了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包括短期的重庆世界新闻学校)、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今日台湾世新大学)等多所新闻专业学校,先后培养新闻传播各类学生近5万人之多,这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亦无人能超乎其右。

成舍我不仅办报、办刊、办社、办台、办(书)局,还计划开设全国新闻股份公司,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从事新闻事业多元化、集团化、现代化管理形式的一位新闻事业管理先驱。

成舍我一生参与及创办过近 20 家媒体(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自己直接创办过 12 家媒体,是中国现代新闻从业者中个人创办和参与媒体最多的一人。

成舍我不仅办报刊、开公司、办学校,还擅长新闻采访、言论写作、报纸编辑、报馆管理等多重业务,他是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一位能够同时从事新闻业务、管理、教育、经营并分别取得不俗成就的“新闻全才”。

凭借这些“唯一”的纪录,成舍我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当该自有一席之地。

除了这些显著成就以外,成舍我先生依据具体时代国情,在其办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亦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本篇论文,旨在通过考察与分析成舍我先生这种独特的“二元一体化”办报宗旨与形成轨迹,尝试对其做出恰当准确的历史评定。

一

在探讨成舍我办报的特有模式之前,我们需要对成舍我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上的“位置”进行一下简单的回顾。

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发展轨迹,海峡两岸历来有不同的学术概括与梳理范式。1978 年大陆地区改革开放之前,大陆新闻史学界对中国新闻史的诠释方法是阶级斗争分析法。通过对新闻史上各类报刊的阶级划分,围绕着新闻史上不同阶段的阶级斗争轨迹来排列各类报刊、事件、人物的位置,并据此展开相关历史的评价。

如今,这种简单化的阶级斗争诠释范式已经不为人们所重视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现代化范式解读中国新闻史发展历程的新思路。然而,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编制中国新闻史发展阶段的诠释方法也存在着诸种的不足。通过对中国新闻史的从新发掘和梳理,学术界近来发现,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国门洞开之后起步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史,还可从媒介自身发展的角度(不同新闻媒介的创办人群、不同媒介的传播功能与特质、不同媒体的创办价值取向等)来进行某种划分,并借以构建、厘清、诠释中国新闻史的发展过程。

依照此种思路,人们把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上不同的(报刊)新闻媒介大致地划分为两大群落(外人报刊、国人报刊)和四种模式:商业营利型报刊模式、政论政

党型报刊模式、独立精英(个体或同人)型报刊模式和官办官报型报刊模式。虽然这种划分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单纯从探讨国人报刊的层面来看,到有一定的简便性与合理性。

依照这种新闻媒介类型史发展角度来进行观察,从纵向时间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大致地划分为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1815—1949年)。从横向报刊类型角度来看,除了外人所创办的中外文报刊以外,国人自办的报刊似可从创办者、功能特点、传播价值等几个方面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官方报刊、商业报刊、政党报刊和独立报刊。

在这四种类型中,官方报刊是官办的,由官员来主持;政党报刊是政党集团创办的,由政党精英人物来主持;而商业报刊与独立报刊则都是民营型报刊,它们都是民间人士所创办的,但一个以商业赢利为办报目标,一个以办报救(兴)国为从业志向,两者间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于后者——中国的独立报刊,一般新闻史学者常将其称之为“文人办报”。对于这些独立报刊的从业者们,知名学者、厦门大学教授谢咏认为他们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报人集团”。他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这个集团有晚清出洋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虽然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①

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特聘研究员唐志宏先生则将这些入称为“媒体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出现以后,中国社会里逐渐有一批文人开始

^① 谢咏:《中国现代新闻传统:文人论政》,《山西文学》,2005年第1期。

“选择纯粹以办报成为一生的志业,这个志业则是以民众的立场为后盾,作为其对抗、监督政府的资本。这群受到媒体产业影响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称其为‘媒体知识分子’,有别于受经书教育为主的传统知识分子”^①。

大陆更多的学者们把这些“报人集团”或“媒体知识分子”——就是以独立办报的方式自由发声的独立报刊现象,称为“文人办报”。

那么,在“文人办报”这一谱系中,成舍我先生又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呢?在此,我们需要对中国新闻史上的“文人办报”现象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文人办报”——按照张季鸾先生的看法,乃是中国近现代报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刊现象。他曾在《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布给该报“最佳外国报纸”奖时发表了一篇社论《本报同仁德声明》,指出“文人办报”(或称“文人论政”)是中国报纸的一个传统特色。他写道:“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时说是特长……我们同仁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很明显,张季鸾先生所指称的这种中国式“文人办报”现象,既具有中国古代传统士人立言、立德、立功的天下为己任之“道统”特色,也与近代新闻事业出现后类似于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类“独立报纸”托大众化现代传媒——报纸而达到公共精英知识分子独立发表意见,以实现自身理想,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有关。本土的传统与外来的专业影响导致了类似于《大公报》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出现。

按照大陆有关学者对“文人办报”现象的总结,从事新闻事业的文人——特别是媒体知识分子大致具有四个特征:第一,论政而不参政;第二,营业而不营利;第三,以文章报国;第四,代民众讲话。^②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成舍我先生办报的媒体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是鲜明的。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新闻史上的“文人报刊”(大约等同于个体文人创办的独立报刊)在晚清时期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民国时期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一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文人报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晚清时期最早生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人报刊雏形,乃是以初期国人中的

① 唐志宏:《报业集团与民国报人之形成:以成舍我“世界报系”为例》,2007年6月15日舍我纪念馆专题演讲。

② 吴廷俊:《论中国文人办报的历史演变》,《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总第6辑),第86页。

洋务新派士人为主体的“个体文人政论报刊”(19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出现在港、沪、广、汉等地的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如1874年王韬创办于香港的《循环日报》,1874年创办于上海的《汇报》,1884年创办于广州的《述报》等。粗略分析即可看出,这批新型士人创办的新式报刊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一,这些“横空出世”的新式报刊是在中华民族遭遇西方外来列强的侵略背景下,由第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通过模仿学习外来的近代新闻媒介而创办的。它们出生伊始,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救亡特征、士人(文人)报国的志向和为国为民的宗旨。

其二,从这批新式报刊的创办人来看,其创办者大多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危亡而觉醒,随着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洋务运动而衍生的“新派士人”。这批新派士人既承继了中华传统儒家士人阶层关心国家大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积极入世的道德价值取向,又具有感慨时艰,睁眼看世界的敏锐眼光。他们开始主动切合世界新的发展潮流,学习办报办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达成维新变法,富强国族之目的。

其三,在中国近代独特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批新派士人,受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传教士、商业和政客开办的各类西式近代新闻传播媒介之影响(其中当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巨),遂开始学习创办新式报刊,企图以之为新的救国之工具,用以达成救亡图存、振兴神州、发达族群、国家富强之神圣使命。为国为民的公共服务意识,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先行的精英型人物主持,以创办新式报刊报效国家的志业,构成了这批最早的文人报刊的“DNA”基因。

其四,由于上述“DNA”的性质,逐渐使得国人初期自办文人政论报刊构成了一个初始弱小、但却绝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报刊类型。它既不像具有外商背景的商业化报纸如上海《申报》、《新闻报》那样——以报刊赢利为主要圭的;也不像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那样怀有殖民者宗教传播或政治私利之企图,而是一批新派士人通过学习与利用西方外来的近代报刊舆论工具,企图应对危机、挽救危亡、实现自己心中理想。这些由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所创办、所经营的新派士人报刊,最后逐渐成形为中国新闻史,也是世界新闻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中国“文人报刊”。

在随后的维新运动中,康梁党人学习借鉴了西方传教士和初期新派士人(以王韬、郑观应、容闳、邝其照等人为代表)的办报方式,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也开始了国人办报——特别是士人办报和政党办报的尝试。

这次国人办报高潮中的办报之主体虽以维新党人为主,呈现出后来政论政党报刊的雏形,然从具体形式上观察,仍可见个体文人办报的影子。譬如梁启超是该时期最为著名的报人,但他所办的《中外纪闻》、《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以其个人的魅力而使读者“如饮狂泉”。天津的严复,虽然被后人纳入维新党人的办报阵营,但实际上仍是一个独立的报人,只不过同情与向往维新改良派的政治主张罢了。另外,像上海《时务报》的汪康年、《时报》的狄楚青等,虽总体来说是维新党人阵营中的健将,但又都是具有个体判断力的独立报人。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政党团体,是国人第二次办报的主体力量。在这个时期,中国新闻史上的政党报纸开始成型。孙中山先生以兴中会喉舌《民报》为中心,聚集了大批优秀的本党宣传精英,集中进行政见宣传。《民报》与其对手《新民丛报》的报刊大辩论提升了政党报刊的社会影响力,使得政论政党报刊成为主流媒介。

然而,就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报刊宣传浪潮中,个体文人的办报队伍仍然存在。即使如著名的《苏报》,虽然发生了与清廷的上海租界官司,扬名天下,但细加考察,当知《苏报》并不是由兴中会出钱资助的革命派报纸,而是由在思想上接近孙中山革命派的人士所主持的民间独立报纸。当时这一类民间报刊为数不少,既有同情孙文主义者,也有强烈反对者。维新党人与孙文党人之间的报刊大争论,就吸引了许多独立的报人加入不同的阵营激烈笔战,相互呛声。

可以说,清末的中国近代新闻史是外来的传教士宗教报刊,外来商人的商业报刊,国人第一批自办的新派文人个体报刊,与第二批、第三批国人自办报刊中政论政党报刊,清廷各地“官报”兴起与成长的历史。在这一阶段,新派文人个体兴办的独立报刊呈现出强烈的中国色彩和独特魅力。

民国时期,“文人办报”现象又有了新的发展并进入了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人办报与西方新闻自由主义思潮的结合。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通常被人们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三次国人办报高潮,这次办报高潮的主体力量仍然是独立的个体文人或情趣相似、政治、文学倾向近似的同仁办报群体。

五四期间最为著名的杂志《新青年》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由陈独秀一人主持的。随着后来同道者的纷纷加入,这份杂志遂竖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中国腐朽的封建文化代表“孔家店”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掀起了伟大的五四思想解放运动。

随后创办的众多五四启蒙报刊中,无论是李大钊的《每周评论》、胡适的《独立评论》,还是傅斯年的《新潮》,乃至《东方杂志》和其他许多著名的报刊,都以标志性的办报人物(或主要主持者)而闻名。虽然这些报刊所传播的思想流派不同,对中国社会的主张各异,但绝大多数刊物都是由一些思想倾向较为一致的同仁们所创办的,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独立的立场,服膺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的独立办报之精髓。

辛亥革命后的各地军阀执政割据时期,中国的独立文人报刊受到了沉重而又残酷的打击。袁世凯时期的“癸丑报灾”,著名记者黄远生被误杀,邵飘萍与林白水惨死在北洋军阀的枪下。但是,由于军阀统治者假扮“政治开明”,相互攻讦牵制,也确实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独立报业的短暂繁荣虚假景象。

民国政府正式建立后,随着国家的表面统一以及东南沿海民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部繁荣,文人独立报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借助于资本市场元素的濡养,加上西方外来现代新闻自由主义思想与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政论型文人独立报刊发展较为迅速,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然而,日寇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正常进程。抗战八年,民族危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新闻事业被作为动员全国军民抗击日寇的有力舆论工具而全体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民营的文人独立报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获得了卓著的名声。

随后的国共三年大规模内战对文人独立报刊的打击非常致命,企图寻求“第三条道路”而不得的独立文人报刊被迫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选择,并最终在大陆地区绝迹。

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文人独立报刊所走过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中国最早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政论精英型报刊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艰难之路,他们一开始并不想独立,而是竭力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洋务维新,努力寻求与封建统治者合作(国人初期自办报刊和维新党人的办报运动都是如此)。然而,由于统治者不仅不接纳这些新式报刊,而且对其残酷打压,这些文人报刊走上了开始渴望,继而失望,最终与颟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彻底决裂(孙中山革命党人报刊)之路,成为了反抗倾覆清廷的强大力量。后来,在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立自重、文人办报,以监督社会与政府、守护民主自由理念的分子精英政论独立报刊类型,如北平胡适等人的《独立评论》、天津的新记《大公报》、成舍我上海的《立报》,乃至后来台湾雷震的《自由中国》等,

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在百年中国新闻史上,这些爱国报刊文人们一开始以呼吁变法、改良维新为目标,应付列强侵略,攻击后党顽派、清朝腐朽政府、五四封建思想、民初反动军阀,经历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继而鼓动全民抗战。国共内战,呼吁和平而不得,走上了一条艰辛困苦,但却光荣有为的道路。

就这样,因为中华民族的时艰,士人传统的嬗变,清廷的漠视与镇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对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的借鉴,中国的独立型精英知识分子报刊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艰难与困苦中,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发挥了有力的影响。

在这一阵营里,成舍我先生的办报活动与所取得的业绩很有研究的意义,这是因为成舍我的独立报纸和相关新闻事业活动创立了一个文人办报的成氏模型——这就是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研究成氏的这一“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中国新闻史上“文人办报”现象与“媒体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多重原因,还能够对后人有所启迪,有益于寻求未来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发展模式。

二

所谓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是指成舍我先生在自己的办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办报思想、办报理念,一种独特的双向度办报价值追求。

如上所述,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国人的办报实践活动中大致存在着个体文人报刊、政党团体报刊、商人营利报刊三种类型。“文人办报”的特点是指一批批仁人志士、自由主义分子、个体爱国者们以报刊为媒,以笔为器,通过独立的办报活动来达成其报效家国、服务公众、强大祖国之目的。政党报刊则以宣传一党一派的政治主张为主,以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为宗旨,自愿充当政党的“耳目喉舌”宣传工具。商人企业家办报则是将新闻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营利性企业,通过积极主动地提供公众消费者“新闻”等消费品而滚动营利。

但是,成舍我先生的办报理念与实践和上述三种类型的报刊均有所不同。成氏办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兼有“文人办报”与“企业家办报”的双重角色定位,具有既追求“文人办报”的办报救国、服务社会、不为私利的终极价值导向,又有重视报馆企业化经营管理,追求报纸市场成功的专业价值取向。最为令人肃然起敬的

是,成舍我的市场化办报目的是为着办报服务国家、服务民族、服务世界此一崇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而存在的。这种看似矛盾,但又最终辩证融合的双向式价值统一体系,形成了成氏独特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成舍我的“文人办报”角色定位与价值追求深受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那些变法图强、抵御外侮、文章报国、独立发声的先进报人们的深刻影响,形成了成舍我“立己、立人、立国”的办报理念。而从横向的学习西方角度来看,所谓的“企业家办报”角色也给了成舍我先生很大的影响,他对这种基于报业市场成熟发展机制之上的办报潮流、办报规律体会很深,形成了他新闻事业大众化、市场化目标的追求定位。这两重目标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前提,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的基础。这样双重角色的叠加与互补最终造就了成氏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并使得成舍我先生取得了我国现代报业史上的许多成就,成为一代报坛巨人。

为了清晰地展现成氏“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的具体内涵,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办报模式中的“二元”价值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成舍我“二元”价值体系中的“文人办报”这“一元”具体表现在哪里。

1. 以新闻事业报效国家民族的爱国办报理想

如前所述,一部百年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血泪情仇的屈辱历史。从近代以降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战争,到几近亡国灭种的庚子事变、辛丑条约;从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到日寇侵华、国共内战,百年的中国历史苦难深重,几乎没有片刻平静的时候。内忧外患、艰难困苦,使得中国许多有良知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和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把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当作自己终身矢志不移的追求目标。无数英雄人物或者揭竿而起,反抗清廷;或者举办洋务,学夷制夷;或者出国留学,遍寻真理;或者实业救国,教育精英。其中,受外来西洋传教士使用现代西方报刊媒介之启迪,从王韬肇始,康梁维新、孙文革命、五四运动、民国北伐、抗日烽火、国共决战,在百年不同的历史时段,都有一群人怀抱着救国志向,学用西洋传媒,办报办刊办社,开智通气鼓呼,创办了一种特具中国文化特色与时代需要的“文人独立报刊”,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个媒体知识分子群体。

这个“媒体知识分子”群体最为突出与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都是深深地热爱着中国这片苦难深重土地的人,在主观意识上都企图以现代新闻传播事业为